



国会面对“询问权”的争议

■ 本报评论员：余凡

2月下旬，三号总统候选人甘贾尔(Ganjar Pranowo)建议斗争民主党(PDIP)在国会(DPR)的议员们策动“询问权”(Hak angket)，绕过司法机构，要求政府当局对2024年大选发生的弊端做出调查。这项建议也获得一号总统候选人阵营的支持，激起了千层浪!

《点滴网》(detik.com)于3月5日报道，在雅加达中区的国会大厦前集会的民众分别有支持及反对“询问权”两个阵营。至于请愿者对所纠结的“询问权”究竟有什么看法?记者决定进行个别访谈，所选择的不是集会的领导，而是随意挑选愿意受访的请愿者。

有位来自万隆市的中年妇女丽妮接受访谈，她承认是阿尼斯(Anies Baswedan)的支持者，所以加入同意使用“询问权”的请愿阵营。她不能回答有关“询问权”审理条件的问题，但仍表达意见：“问

权是为了肯定大选过程的公正、诚实和真相，因传言说发生很多错误和舞弊。所以我们认为国会使用询问权能够自主地依法查明选举过程中的真相。”

另一名支持“询问权”的七旬老人苏可隆表明，因为2024年大选过程出现弊端，所以需要行使“询问权”进行调查。他说：“询问权是国会对政府，尤其是本届大选进行调查的权力，至少由30位议员提议，何况有几个党团支持。当然，这是议员个人的权利。”

记者也对反对“询问权”的示威者进行采访。他们看来十分年轻、充满活力，穿着各种颜色的院校外套，部分举着国旗，部分拿着“反对询问权”“反对弹劾总统”的标语和横幅。

但记者要求采访时，他们大多数以“不愿意多说”“身体很累”为借口而表示拒绝。

幸亏记者遇上位27岁的马达族青年菲克里，

他是“反对询问权”的请愿者，他认为：

“如果我们弹劾佐科维总统会有什么后果?是谁将领导这个国家?哪位领导人是我们所期盼的。没有领导人的印度尼西亚将成为迷途的羊群，必将支离破碎。”“询问权与总统大选是两码事，以询问权调查选举，那乱透了。若调查渎职问题，那还可以接受。”

根据2014年第17号宪法199章有关人民协商会议(MPR)、人民代表(DPR)、地方代表(DPD)及地方人民代表(DPRD)的条款中注明，国会若要行使“询问权”须符合各项规定：首先，由超过两个党团的25名议员提出，附夹与所“询问”的宪法及法规相关资料。其次，召开超全体议员半数参加的讨论会，并得到超半数参会议员的支持。“询问权”议案由提议者呈交国会议长，议长在全体大会上宣布“询问权”建议，并将议题分发给所有议员，而提议者必须在

大会上说明并解答各项提问，国会有权决定接受或拒绝该项建议。

《商务网》(Bisnis.com)于3月6日称，国会(DPRRI)议长普安(Puan Maharani)表明她不能参加国会第13届全体大会的理由，因为要往法国巴黎参加国际议会联盟(IPU)举办的本年度议长高峰论坛。期间，普安将与法国国民议会布劳恩·皮维(Yaël Braun-Pivet)举行双边会谈，为了“印尼与法国之间的友好和积极关系，已经维持了73年之久。”

更重要的是，全球所有“女议长”都到了巴黎，相互交流各自国家及国际社会有关国民议会的问题和经验，借着这次会议提升议会外交的力度。“通过这个论坛，各国女议长们能加强信任、交换经验，并为共同提升世界女性地位和影响力的努力凝聚更大的力量!”

因国会第13届全体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讨论议员们是否启动“询问

权”程序，国会议长普安的缺席被套上了形形色色的揣测;有的议论认为可能是支持“询问权”的党团已开始泄气，甚至猜测有个别议员已被“劝退”。也有专家分析，这是PDIP为避免调查大选过程的“询问权”被刻意炒作、误导成“弹劾总统”，恐将引发底层民众的抗争。

《罗盘网》(KOMPAS.com)于6日报道，在国会是否有能力通过“询问权”对2024年大选弊端做出调查的热烈争议中，突然传出中爪哇前省长甘贾尔被告到肃贪局(KPK)的消息。据说是与中爪哇银行(Bank Jateng)总经理某S于2014至2023年分派的红包有关。

肃贪局副局长马尔哇达(Alexander Marwata)宣称，所有交到肃贪局的贪污举报，都根据实证进入调查程序，并不关注被告的政党政治地位。他说：“如果我们，从不关注是否否有政治背景，是不是红的、黄的、青的或灰色，我根本

不这样看。”“我相信，肃贪局的调查员也绝对不是看被告是什么颜色。”但各界对肃贪局的“立场”都颇为担心。

据称，举报甘贾尔的是印尼警察观测(IPW)会长苏庚(Sugeng Teguh Santoso)，他于5日对媒体表示：“IPW举报有可能发生收领奖赏或贿赂，由中爪哇银行经理向数家保险公司摊派的。”据说有高达16%的回扣，有相关的三个部门高层进行分派。IPW向来关注涉及警务的事件，有别于印尼贪腐观察(ICW)的专长，这次“越界”发难，让舆论界惊讶。

《时代网》(Tempo)于7日称，甘贾尔澄清：“我从未收到IPW所提的所谓分红包或回扣。”近来对甘贾尔的抹黑及攻击层出不穷，估计是与他提议国会“询问权”的言论有关。更有政论员摊牌，IPW的苏庚也是印尼团结党(PSI)的干部!又一个“双重身份”的政客。

这场记者会向世界传递一个清晰信号

■ 国际锐评

中国怎么看世界?如何与世界互动?早春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了中外记者21个提问，涉及大国关系、地区热点、全球治理等诸多议题。“针对性解读议题，明确表示支持什么、反对什么，让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立场和中国担当。”——观察人士对《国际锐评》这样评价。通过这些答问，外界接收到一个清晰信号：中国正以自身稳定性为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

“中国将坚定做这个世界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进步力量。”不少外媒将中方这一表态提拎出来，作为中国外交的宣言。这也是读懂中国给世界带来稳定性的三个维度。

和平是首要大事。当前，乌克兰危机持续，巴以局势升级，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作为一个将和平摆在基因里的大国，中国不仅希望自己安全稳定，也积极为世界和平奔走。2023年，从推动沙伊两国握手言和，到斡旋乌克兰危机，再

到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巴以问题的第2712号决议，很多人感叹，维护和平，中国为什么“能”?

本次记者会上，中方道出了中国特色的热点问题解决方法，那就是坚持不干涉内政、坚持政治解决、坚持客观公正、坚持标本兼治。这“四个坚持”是中方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智慧。英国《卫报》称，中方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努力“激发了关于结束战争方式的创造性思考”。

稳定是发展的基础。当前，某些西方大国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严重冲击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加剧了世界动荡。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上，大国负有责任。记者会上，中方谈到了中美、中欧等大国关系问题。无论是对美方打压中国的连环四问，还是以“红绿灯同时亮起”比喻中欧对华定位的自相矛盾，中方的表态坦率真诚：诸如“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应当成为中美双方的共同遵循和努力方向”“只要中欧互

利合作，阵营对抗就搞不起来”的表态，值得相关国家认真思考。

人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国际秩序?中方的回答是：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这是中方倡导的全球治理方案，符合时代发展大势，反映了“全球南方”的共同心声。基于这个方案，就不能有的国家在餐桌上、有的国家只能在菜单里，也不能搞阵营对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而要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内行事、做大要做大并分好经济发展的蛋糕，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中国这么做，也早就这么做了。十年共建“一带一路”，这一公共产品已经成为全球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提出的“三大倡议”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从2023年推动金砖国家扩员，到2024年主办新一轮中非合作论坛，中方的努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关键力量，给全球治理带来新气象。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金钥匙。面对当前全球发展动能不足、个别国家搞“脱钩断链”，中国坚定表示，必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本次记者会上中方宣布，自3月14日起，进一步对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六国试行免签政策，传递出积极开放的信号和决心。

2023年，中国以5.2%的增速贡献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中国牌”发动机依然强劲。目前，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同世贸组织发达国家相当水平，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缩减到31项以下，制造业准入全面放开，服务业开放加速推进，外商投资收益率居全球前列。中国式现代化正在造福全球，充满机遇的中国不应错过。

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中国的心愿，也是担当。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国越发感受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中国“稳定器”的不可或缺。2024年春天，中国两会上传出的讯息，给世界带去春意，推动世界稳下来、好起来。

两个维度观察中国国防支出预算的“和平底色”

■ 两会观察

中新社北京3月8日电 中新社记者 马帅 莎马德林

中国的国防支出预算问题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是外界关注焦点之一。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国防支出预算16655.4亿元人民币，增长7.2%，增幅与去年持平。

对于中国国防支出预算，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委员表示，要正确理解国防支出预算的“和平底色”，需通过两个维度观察。

首先，国防支出预算不能只看数字大小，更要看其用途是什么，效果如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杨明杰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始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同于一些军事大国将财政预算直接用于战争军火制造，中国国防支出是为了应对自身面临的复杂安全挑战，也是为了维护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

记者梳理发现，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声音在今年两会上有明确释放。比如，回答中国第四艘航母在建情况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袁华智强调，中国建航母不是为了跟美国比，而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国家权益。

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大会发言人娄勤俭在人大会议首场发布会上提到，中国总体保持国防支出合理稳定增长，是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需要，更好履行大国国际责任义务。

具体而言，作为海陆兼备的国家，中国本身面临复杂的陆地边界与海洋权益问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积极参加国际灾难救援和人道主义援助，尤其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军事能力提升，获益的不仅是中国，更是世界。”杨明杰说。

第二个维度在于，中国国防支出预算始终控制在

合理范围内。

中国国防支出预算多吗?据娄勤俭介绍，与美国等军事大国相比，中国国防支出无论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还是国民人均国防费、军人人均国防费等，一直都较低。

中国军网“钧正平工作室”8日发文说，从2016年起，中国国防费预算连续9年保持个位数增长。反观其他国家，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国防预算增幅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拿国内生产总值比来说，中国国防费常年维持在占比百分之一，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美国的这一比例在3%以上。按人均军费开支算，美国则是中国的15倍多。

文章称，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这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事实上，对照国防建设需求，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盼，中国军力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我们正在发展中弥补差距，而不是要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杨明杰说。

然而，为何仍有一些外媒炒作“中国军力威胁论”?杨明杰表示，这种恶意猜测的核心仍在于其对军海军事政治委员袁华智强调，中国建航母不是为了跟美国比，而是为了保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保护国家权益。

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在阐述今年收支政策时，明确了国防预算支出方向，其中提到，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研究完善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支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就业等工作。

针对所谓“隐形军费”猜测，杨明杰表示，这是一些西方国家的“镜像式”思考，在用他们自己的做法来揣测中国，中国国防支出预算向来适度合理、公开透明。

正如娄勤俭所言，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愿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地缘风险频发凸显中欧班列稳定器作用

■ 新华时评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新华社记者高文成

“30年来第一次没有任何一艘汽车运输船过境红海。”欧洲船东公司如此感叹近期红海危机影响。一段时间以来，红海安全形势持续恶化，航运公司被迫绕行，海上运输成本大幅上涨，抵达时间难以预测，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航运困局难解之际，“中欧班列提前订满”“红海危机证明中国走在了前面”等新闻标题频频见诸国际媒体报端。在红海危机等地缘风险频发、全球物流和供应链遭受冲击的背景下，中欧班列的稳定器作用更加凸显。

红海是全球海运线路上的重要航道。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在红海水域发动袭击，以示对巴勒斯坦的支持。美国等对胡塞武装目标发动空袭，导致局势更加紧张。很多国际航运公司被迫暂停红海航线，绕行非洲好望角，亚欧贸易往来时间成本陡增，运输成本翻了不少一番，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失衡，引发连锁反应。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东亚—欧洲航线上约有47%的玩具、40%的家电产品和服装的运输正受到运费上涨和延期抵达的影响。部分工业原材料难以交货，特斯拉、沃尔沃等大型企业在比利时等地的配件工厂被迫暂停生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易物流处处长扬·霍夫曼说，红海危机“正在给本就脆弱的全球贸易和供应链带来破坏性的影响”，“这些干扰凸显了海运在面对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气候变化时的脆弱性”。

风险面前，全球物流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霍夫曼提到的“脆弱性”，重新审视货物运输选择，寻找更安全可靠的运输方案。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月初援引荷兰铁路桥货运公司执行董事伊戈尔·坦巴卡的话说，过去四周，中欧班列预订量增长37%，“对铁路运输的需求爆炸式激增”。中欧班列“提前订满”的主要原因，正是这条运输线提供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最稀缺的资源——稳定性。

中欧班列受外部环境影响小、稳定性高。中欧班列开通数条全程时刻表线路，沿线

路、班期和运行时间，重点对口岸站换装、交接等作业环节予以合理控制，境内外全程运输时间相对固定，为客户生产组织、物流贸易、资金周转提供了稳定预期，可以更好地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美国媒体指出，红海危机等地缘风险暴露了海上咽喉的脆弱性，相比之下跨欧亚铁路货运量的可靠性和准时性更高。

在提高供应链稳定性之外，中欧班列还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红海危机爆发后，对中欧班列的货运需求已上涨100%。从重庆输往欧洲的铁路集装箱运费因为供需关系变化增加约20%，但仍比目前海运运费便宜约三成，海运相较于中欧班列已失去价格优势。效率更高是中欧班列对海运的天然优势。中欧班列从重庆发车至欧洲仅需15至20天，比红海航运快7至10天。中欧班列的效率还在不断提升。目前西安往返德国杜伊斯堡只需要10天，比2023年又缩短两天，和最早的班列相比缩短了约一周。

“红海危机证明中国走在了前面。”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如此论断，正是看到了中

欧班列的更大价值，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大动脉，中欧班列已联结欧洲25个国家219个城市，在动荡世界中构筑起一条安全畅通的产供应链生命线。中欧班列运输服务网络基本覆盖欧亚大陆全境，有效扩大了中国与沿线各国经贸往来，深化了国际产能合作，加速了要素资源跨国流动，为亚欧大陆发展注入新动力。

《外交政策》刊文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代表了每个国家为了本国利益都应该去做的事：建立尽可能多的供应通道。这既可以对冲不可见的供应中断，又可以增强本国的联通性和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中欧班列与海运航线不是相互竞争、争夺资源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中欧贸易不可或缺的通道网络。

世界经济运转离不开全球货运和商品贸易。在地缘冲突重创全球供应链的背景下，中欧班列的优势与贡献弥足珍贵。这也再次说明，在当今全球风险挑战叠加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稳定和繁荣世界经济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